

摘要

李逸樵（1883-1945）為日治時期重要的詩人、書畫收藏家與書家。本論文試圖透過報紙上的文獻材料與遺存的作品，重建李逸樵的書畫收藏觀與出版活動，並探究其書風蛻變的原因。

在日本官方人員伊能嘉矩（1867-1925）、尾崎秀真（1874-1952）的調查之下，台灣明、清時期的書畫家作品作為了解台灣文藝發展的史料被珍視與收藏。1917年「台灣關係」書畫展可被視為調查成果之一，不過其性質仍停留在賞鑑層次上。1926年，李逸樵編輯付梓《大東書畫集》，他開始參與、建構台灣書畫史的書寫，李逸樵的文字充分展現對於書畫家生平傳記、寓台歷史事蹟的高度意識與興趣，不斷深化台灣書畫的歷史內涵與文化意義，李逸樵亦參考1920年連橫《台灣通史》的書寫，他試圖替書畫家作台灣歷史的定位。《大東書畫集》的出版與流通似乎起了漣漪，到了1930年代，日、台藏家社群大多有關注台灣關係書畫的現象。更重要的是，李逸樵對於「台灣關係」書畫的研究與收藏也牽動他行草書風的變化。透過風格比較，可發現他在1930年後，更加積極地學習、轉化清朝福建書家謝曦的大字書風，線條質感趨於雄渾與粗糙。

1930年史料展增添許多材料，試圖展示一部較有時序感的台灣書法發展史，原先傳記不詳的福建書家謝曦被納入此敘史架構中，被賦予極高的書史地位。透過本文研究可知，謝曦之所以被重整入台灣書法史的序列之中，在於謝曦的大字書風指涉著日本江戶書史中最核心的部分。李逸樵的書風蛻變，代表的是他在日本殖民台灣的特殊時空裡，對於自我歷史文化認同的摸索與再塑。然而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台灣進入皇民化時期，隨著政治局勢的轉變，李逸樵研究收藏與學習台灣關係書畫的空間也將受到限縮。